

評朱永杰《清代駐防城時空結構研究》*

許富翔**

近年來關於八旗駐防的研究已不再是清史、滿族史研究者之專利，而是逐漸運用多元學科的視角，得到許多新的見解。而朱永杰的《清代駐防城時空結構研究》一書就是利用城市歷史地理學的視角，對清代駐防城研究的新著作。

朱永杰，1976年生，2002年進入北京大學城市環境學院，200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擔任專任研究人員，研究專長為歷史地理學、北京學，發表文章20餘篇。

本書是作者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歷經5年修改後的作品。該書除了序論、結論之外共分七章。第一章討論駐防城的概念、數量問題，並論述駐防城的基本特徵。作者在此歸納駐防城的基本特徵為：軍防特點顯著、經過規劃設計、有特定位置關係，另外除了城池不確切的駐防城外，大部分駐防城建造了城垣、界牆(頁42)。第二、三、四章作者分別以畿輔、直省、東北與新疆為區域單位，第二章討論駐防城的管理機構及其軍事實力，第三章對當地駐防城的時

* 朱永杰，《清代駐防城時空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07頁。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間發展特點、地域分佈特徵做深入討論，最後則全盤性對觀察清代駐防城發展特徵進行總結。作者認為清代各地駐防城表現出來的特點既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其差異性，不應用一個僵化的標準來界定(頁 201-202)。第四章對當地駐防城的形制、特色做深入討論。作者認為清代駐防城形制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城牆或界牆完整確切的駐防城(如杭州)；第二類是駐防八旗民族成分以游牧或打牲族人組成的駐防城(如歸化)；第三類是駐防兵員和設施分佈集中但沒有專門城池的駐防城(如熱河)；第四類是位於城內某處但是沒有專門獨立建造駐防城城牆的駐防城(如廣州)。另外，作者也對各地駐防城的規模、城牆質地、形狀做出歸納整理(頁 263-266)。第五章討論駐防城的設施，第六章則是討論駐防城整體空間結構(包含規劃思想、規劃原則及其空間結構特徵)，第七章則是以太原滿城為個案，對其建置過程、形制、內部設施、駐防兵丁數量及內部經濟結構做深入分析。

綜觀全書，作者運用大量的官書、地方志、輿圖、筆記等資料，並運用城市歷史地理的視角勾勒出清代各地駐防城建置沿革。特別是駐防城時間發展與地域關係、駐防城的形制、設施、空間結構是作者著力最深的部分，並利用最新的繪圖技術，呈現駐防城的整體佈局，頗具新意。該書思路縝密、內容豐富，但個人仍試圖提出若干管見，對作者提出部分建議。

首先是本書所運用的史料。清代修志風氣盛行，由省志、府志、縣志至鄉鎮志構成相當綿密的系統，故現今保存大量的清代方志。由於八旗駐防遍布全國各地，故各地方志對於駐紮當地的駐防亦有相關記載。作者認為方志對於駐防城的記載相當詳細，方志等級越低，詳細程度越高，可資利用的材料也就越豐富(頁 18)。個人則認為作者此說似乎過於武斷，本人過去亦曾利用方志資料對江寧駐防做過研究，較特別的是，清代江寧地區的方志如《重刊江寧府志》與《同治上江兩縣志》，似乎對江寧駐防城記載甚少；方志所繪製的江寧城圖，關於駐防城部分不是不畫就是相當簡略，由此例可看出方志等級越低不等於史

料記載更加豐富。同時，本書第四章論述各地駐防城形制，所運用的史料以《欽定八旗通志》與各地方志中的資料，但作者所採用的方志似乎以單一時期的方志為主，如江寧駐防城採用嘉慶《重刊江寧府志》、杭州駐防則採用四庫全書收錄的《浙江通志》，由於清代各地每隔一段時期就會重修志書，若作者以單一時期的方志做考證可否看出清代各時期各地駐防城前後的變化？另外，作者在書中繪製了大量各地駐防城平面圖，然而這些地圖似乎不夠詳細。近幾年中國大陸大量重新出版清代時期的城市地圖，這些地圖藏有豐富的圖資，若能參考必能豐富該書內容。

其次是作者論述各地駐防城的地域分佈時，對各個駐防城設立的原因似乎偏重強調地理因素(特別是戰略意義)，而忽視各地駐防成設立的歷史背景。例如作者在書中強調江寧駐防是龍盤虎踞，擁長江之險，並且可外連江淮，內控湖海(頁 116)。不過作者似乎沒注意到江寧的前身——明代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它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所以在清朝初年的抗清運動中，江寧一直是南方抗清人士極欲佔據的一個城市，清初福王在此建立南明政權、鄭成功北伐入長江口均是著眼於此。而熱河駐防的設立，其原因與清朝皇帝在此建立避暑山莊做為木蘭秋獮的預備場所、處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心有關；而另外部分原因則是為了解決京師八旗的生計問題。而其他各地駐防設立的時空背景，定宜莊教授在其大作《清代八旗駐防研究》已有相當完整的論述，但作者似乎沒有在書中提及。此外，作者指出歸化駐防城為康熙年間所設立諸城之一，屬於「山西駐防體系」(頁 101)，並論述略述設置沿革(頁 110)。但作者並未進一步說明屬於將軍、副都統之右玉、歸化、綏遠三城如何與山西巡撫兼轄的太原駐防城，成為一個體系？且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二城歸屬於哪地區之「體系」，本書似未交待。類似跨邊界之駐防城之體系範疇，應有說明。

第三，關於駐防城的形制，作者已有充分的考證並做出歸納整理。該書舉出畿輔駐防的滄州、保定、鄭家莊、熱河等處駐防城，其座落形式比較特殊，沒有建設固定城牆或其他隔離性城垣，所以這些駐防城不具有固定形狀(頁 208)。作者在此似乎為了凸顯「城」的概念，而將這幾處沒有城牆的駐防以「駐防城」一詞稱之。但個人認為這幾處既然沒有築城，是否適用這一名詞仍有疑義。例如熱河，雖相關方志沒有記載熱河八旗在當地分佈的位置，但個人根據熱河駐防旗人後人布尼阿林〈熱河八旗駐防簡述〉一文的回憶，以及《承德府志》所收入之「承德府沿圖」相關圖資，很明顯的發現駐紮在承德一地的熱河駐防八旗似乎是負責清朝皇帝巡幸避暑山莊的任務做分佈，特別是為了拱衛避暑山莊及其沿途御道。故就任務而言，熱河駐防八旗似乎並不需要建立駐防城；而在清代官書、檔案中對於該處又多以「熱河駐防」或「熱河八旗」稱之，故「熱河駐防城」一詞似乎並不貼切。關於直省駐防的形制、規模、質地、形狀、城門等問題(頁 210-230)，作者在書中亦有論述，但卻沒有注意到有幾處駐防的形制是受到本身歷史因素所影響。例如江寧駐防城的前身是明代南京皇城，西安駐防城則是據明代秦王府為中心加以擴建，而杭州駐防城則是圈地而建導致其城市形態呈現不規則形狀。而且清中期太平天國的爆發，導致許多南方直省駐防城如江寧、杭州等處被嚴重破壞，也對其城市形態產生影響。如江寧駐防城在太平軍進入後，其北面與西面的城牆被拆毀，這些拆下來的城牆磚移去做洪秀全所居住的天王府(今南京總統府)建設之用，後清軍收復江寧並未重建駐防城；而江寧駐防八旗的兵丁營房，也從駐防城西側移至南側，如此重大的城市佈局變化並沒有在該書中見到相關論述。同時，無駐防城的情況包含熱河、察哈爾、布特哈等駐防，其中察哈爾，並未列入該書的「駐防城統計總表」內(頁 50-53)，但作者卻又於頁 93 與頁 209 又提到察哈爾駐防城，故其定義、範

圍有所矛盾。統計總表亦有缺漏，其中有多處註明駐防城「無上級」首長的情況，此不太符合各地駐防行政體系的實際運作。

第四，該書提到駐防城的規劃受到了五行相勝思想所影響。在中國城市規劃思想中，五行與風水觀念一直受到重視，特別是在都城建設中得到體現。滿族統治者吸取漢文化或多或少也可能接受這樣的概念。《八旗通志·初集》記載：

本朝龍興，建旗辨色。制始統軍，尤以相勝為用。八旗分為兩翼：左翼則鑲黃、正白、鑲白、正藍也；右翼則正黃、正紅、鑲紅、鑲藍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向離出治。兩黃旗位正北，取土勝水。兩白旗位正東，取金勝木。兩紅旗位正西，取火勝金。兩藍旗位正南，取水勝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師，或夜行則黑色難辨，故以藍代之。五行虛木，蓋國家創業東方，木德先旺。比統一四海，滿漢一家，乃令漢兵全用綠旗，以備木色，於是五德兼全，五行并用。

可見在《八旗通志·初集》中似乎很明確地提到了八旗方位與陰陽五行學說有關，「尤以相勝為用」。但駐防城的規劃原則與其說是受到五行相勝思想所影響，不如說是受到八旗固有行軍方位原則的規定。孫啟仁在〈清初八旗方位與陰陽五行學說〉一文中就提到：

一、八旗與五行旗不是同等含意的概念；二、八旗軍隊的戰術不附合建立在五行基礎上的中國古代陣法；三、陰陽五行思想對八旗方位排列方面所起的影響不能過於誇大；它不附和八旗制度來源於女真狩獵生產生活的基本事實，也不符合八旗制度經歷了一個創建和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

杜家驥在《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則認為八旗方位原則使軍隊在攻城、圍獵時減少發生矛盾，便於應對處理，還可減少各固山(*gūsa*)間的利益矛盾，固定八旗的土地分佔方位、城內居住方位，從京師至各地駐防八旗均遵守這樣的原

則。經由兩位學者的考證可見八旗方位原則與五行並沒有關係，《八旗通志·初集》的記載應是當時附會的說法，但作者在書中卻反覆強調各地駐防城均受到五行相勝思想所影響。而本書圖 6-2「清代西安滿城八旗駐防分區示意圖」(頁 343)，作者在此以八旗方位原則將西安滿城均分成八等分，標示八旗分佈的位置。據光緒年間刊刻《大清會典》記載西安兵丁人數約 6,000 人左右，故當地兵丁加上軍眷應不超過 30,000 人。這樣的人數要像京師八旗做環狀分佈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若按照清廷制訂八旗方位原則將會使營房分散，如此一來遇到緊急事故時軍隊集合速度將會變慢，同時在管理上也會造成不便。史念海先生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所收錄的雍正十一年(1735)與光緒十九年(1893)的西安府城圖均清楚表示西安八旗駐防的營房分佈在八旗教場東側，成南北向長條狀。而作者所根據的資料是宣統元年(1909)成書的《陝西清理財政說明書·歲出部·軍政費》中關於旗餉部分，該文提到「(西安)旗營駐省城之東北隅曰滿城，城分八區，區分五段，共四十段」。文中所指的「城分八區」是否如作者繪製的圖那樣將駐防城均分成八等分，仍有疑義。

最後，該書似有許多缺漏之處。該書圖 2-3「其他八旗組織圖」(頁 44)，「總管」之上，應加副都統、領隊大臣；頁 49 至頁 50 論述東北地區駐防，卻將位於新疆與蒙古的新疆駐防、烏里雅蘇臺駐防、科布多駐防歸入東北駐防體系；作者在第二章花費很大的精力做了「區域內駐防城之間互調官兵統計系列表」(頁 77 至頁 82)，其各表標題，均寫做「某某地區駐防城之間互調官兵統計表」，包括畿輔、山東、山西、江南等表格。但駐防官兵互調似乎不限於該駐防地區之內，也可能跨越數省至其他地區，項下之惟表內「輸出」與「接受」之駐防城均不限於該直省、該地區，故其表格名稱不精確。若將「之間」一詞或改為「輸出」，「即某某地區駐防城輸出、互調官兵統計表」似較準確。該書第三

章標題「駐防城時間發展和地域分布」，其中「時間發展」應指「建置沿革」(頁 87)；第三章圖 3-5(頁 136)，「副都統」一欄應補上「盛京」二字較為準確。

以上是個人閱讀此書所得到的些許感想。綜覽全帙，作者透過城市歷史地理學的視角，對清代各地駐防的城市佈局進行系統化研究，為其重要貢獻。同時，該書是討論清代駐防八旗領域最新研究的成果，也與清代軍事史、城市史等課題有關係，並全面說明清代為數近百的「駐防城」其設置過程及地理特徵，可做為了解清代全國各地駐防城一般情況的參考工具書。